读史札记

“康乾盛世”之说的由来

刘焕性

“康乾盛世”之说并不是今日史学界凭空构造出来的说法，而是对以往既有之“康乾盛世”说的一种批判性采用。早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 三月，康熙帝以“恩诏”的形式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是时人最早的关于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评定。乾隆时期，很多文人和官员在其著述里称其所处时代为“盛世”。乾隆二十四年 (1759)，清政府在统一了新疆全境后，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赋诗称颂乾隆皇帝云：“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铄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素余堂集》卷二四)。乾隆自己也宣称：“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王先谦：《东华录》乾隆，卷六七)、“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乾隆《圣训》卷一零六)。至嘉道时期的龚自珍和魏源等人，面对社会动荡不安、官场腐败、人才受压抑等社会内部所蕴藏着的危机，提出了相对于“盛世”的“衰世”说，对康雍乾时期进行了很高的评价，比如《龚定庵全集类编》里的《四先生功令文叙》一文记述道：“盛世之盛，唐之开元、元和，宋之庆历、元佑，明之成化、弘治，尚近似之哉……四先生皆生世家，皆起家甲科，其仕也，始终全盛之朝……我朝山川发诩，自康熙初元以来，如日炎炎”。而在 17 世纪末和几乎整个 18 世纪，在欧洲社会出现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热”。有学者认为“中国热”的出现与欧洲此时正酝酿着走出中世纪的巨大变革的历史背景有关，但同时，这也与此时中国的国力较为强盛，是一个屹立在东方的神秘的、不可侵犯的大国有关。① 到了 18 世纪末，欧洲中国文化热开始退潮，进入 19 世纪之后，欧洲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更趋淡化，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英国战胜中国，从而中国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就更变相了，迅速成为被歧视的对象。

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当时的一些史家、文人面对国家所遭受的苦难，便借颂扬康雍乾时期的历史来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慨，如赵尔巽等人撰写的《清史稿》、黄鸿寿著的《清史纪事本末》和印鸾章编的《清鉴》里，就对康雍乾三朝作了相当美化的描述，而 191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汪荣宝、许国英著的《清史讲义》里，也继续明确称康雍乾之时为“全盛”时期。

古人对历史基本上持的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孟子曾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认为历史就是在“一治一乱”的模式中曲折前进。南宋时理学家朱熹也讲到：“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有一乱，一乱必有一治”(《朱子语类》卷十六)。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进一步讲到：“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一离而一合，一治而一乱，于此可以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读通鉴论》卷十六)，可以说气运一盛一衰，社会一治一乱的

[收稿日期] 2002 - 10 - 5
[作者简介] 刘焕性 (1972 —)，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北京 100872

观点是古人对历史的基本观感。

古人“治乱”史观下的“盛世”观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国内以孟森为代表的清史专家已开始采用新的理论视角来研究历史。孟森在其遗著《清代史》里面，主要从巩固疆域和学术文化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切入，称雍乾时期为“全盛”时期。[②]此说法虽字面上与旧时相同，但实质内涵已与旧时有所差异。标志着人们已开始慢慢走出了盛世和衰世这样的认识圆圈。此后，随着唯物主义史学在国内主流地位的确立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西方年鉴学派理论为代表的史学思想的传入，史学界对康雍乾时期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当代的史学家而言，在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卷中，从政治、经济、和边疆巩固、民族统一几个方面入手，认为康雍乾时期可称为“康乾盛世”。另外在史仲文和胡晓林主编的百卷本《中国全史》中，也从类似的方面，称康雍乾时期为“康乾盛世”。而称这一时期为盛世，并不是说它就不存在问题，众多的学者在著作和文章里都指出了这一时期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与潜伏着的严重社会危机。

当今国内清史学界继续批判性地采用康雍乾时期为“康乾盛世”之说，对此已有相当深刻和令人信服的论述。[③]观之当代西方史学界，他们在研究清代历史时，也大多将康雍乾时期称为“盛世”或“盛清”，其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在《盛清，1683 - 1839》和《洪业——清朝开国史》两书中认为，清朝统治之下的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令欧洲君主羡慕的是，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都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④]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甚至将乾隆统治时期称作是一个“镀金的时代”，虽然他的要义在于揭示18世纪晚期的盛世之下潜伏的危机与焦虑。这当然是对“盛世”之说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批判性采用。[⑤]同样罗威廉在其近著《救世》一书中也谈到，18世纪中期即雍正时期到乾隆统治初期(大约从1725 - 1775年)的这大约半个多世纪，曾经被西方学者羡慕的称之为“盛清”，而他自己在研究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⑥]另外在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人所著的《世界文明史》里面，也谈到了康雍乾时期，并称乾隆时期为清朝的极盛时期。其他的还有许多著作里也有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可以说当今中西方史学界，对于“康乾盛世”之说基本上是认同的，问题只在于对如何认识“康乾盛世”和其存在时间的界限上有着差异，这样的差异有可能帮助史学界更加深刻地对康雍乾时期各方面的状况作出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阐释和解说，从而在中西方史学界形成关于认识这一问题的对话和交流。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研究康乾时期的历史，并非要生硬地抬高其历史地位，而是要深化对这一时期的认识。虽然康雍乾时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有重大功绩，但这一时期潜伏的危机却更发人深醒，对后世具有警示作用。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康乾盛世”，必然会推动该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①参见许明龙著《欧洲18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参见孟森编著，吴相湘校读《清代史》，台北市正中书局，1989年版，第237——342页

③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和《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郭成康等著《康乾盛世历史报告》。阎崇年主编《满学研究》第五辑。高翔著《近代的初曙》。李治亭著《清康乾盛世》。另外参见朱诚如《论清前期的历史走向》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和2002年《中华读书报》刊载之《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以及《也谈康乾盛世——文字狱、学者的待遇及其他》等文章。

④参见 Frederic Wakemen Jr. “High Ch'ing, 1683 - 1839,” in James B. Crowley, ed.,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arcount, Brace and World, 1970), 1 - 28. 另外参见魏斐德著，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⑤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2—62页。

⑥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 - 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